

# 关于新旧教材一则相异表述的史料实证探究

◎ 隽军宁 北京市第九中学

魏源及其《海国图志》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篇不可旁绕的章节，旧人教版教材与新版教材《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（上）》对此均有介绍，但具体表述有较大不同。主要区别是：旧人教版重点阐释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思想，并作出重要结论：“这就明确了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、方法和目的，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，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启迪作用。”而新版教材只是提及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而已，没有予以重点阐释，也没有提出相关结论。

多少年来，我们对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及其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思想给予崇高的赞誉，尽管新版教材对此只是一笔带过，但或许我们一线老师还会不假思索地向学生强调其作用，即“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，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启迪作用”。

但为什么新版教材在这里有所忽略呢？恐怕不是无缘无故。问题在于，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及其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思想，到底有没有起到“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，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启迪作用”。如果是，那么新版教材虽然忽略，我们完全可以在教学中予以补充。如果否，那我们就要有所注意了。

如何确证呢？史料实证是科学的方法和途径。本文试图通过史料实证对此提一看法，并求教于高明。

## 一、有关“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”一句的史料实证及思考

1. 魏源本人是否真正看到了当时的“世界形势”？

《海国图志》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，重在介绍各国历史地理，虽有一些政治、经济的记述，但严重缺乏广度和深度。我们不能说了解各国的历史

地理对认识“世界形势”没有帮助，但也绝对不能说了解了各国的历史地理就等于真正认识了当时的“世界形势”。如果认真查阅原著，就会发现，即便是对各国地理和风俗人情的介绍，《海国图志》亦有不少荒诞之处。试举一例：

“更有一岛，土人言其泉水甚异，于日未出时往取其水，洗面百遍，老容可复如少。”“又有一岛，名百尔漠达，无人居，魔丛其上。其侧近海，无风恒起大浪，海船至此甚险。四十年间，曾有一船至彼，魔蓦登其舟，舟中人皆惊仆，独一舵师不为动，且诘问何物。魔即应言：‘舟中有何工作，我当代汝。’舵师指授所为，魔一一与言相反，如命东即西，命行则止。舵师恍悟一法，乃颠倒命之，舟即疾行，甚如飞鸟，海道三万里，三日而至。抵家言起程之期，人皆不信，视所寄书中日月，果然。其怪异如此。”<sup>[1]</sup>

若非稽核原著，恐怕我们难以置信《海国图志》竟有如此记述。我们或可说这是白圭之玷，无关宏旨。那就让我们再查证一下，《海国图志》的“宏旨”是什么？

“是书何以作？曰：为以夷攻夷而作，为以夷款夷而作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”，这是魏源开篇即说明的著书目的。但我们也发现魏源用大量篇幅论证的主题：“中国为全世界最优”，即所谓“天朝上国”。

魏源的论证分为三步（详见原著）。<sup>[2]</sup>

第一步：依据佛经把世界分四大洲。

第二步：四大洲中“阿细亚洲”（亚洲）最优。理由是“儒教、佛教、回教、天主教，皆生于阿细亚洲”，“天文算法奇器，亦皆创于阿细亚洲，而后流被于欧罗巴洲”。

第三步：论证中国在“阿细亚洲”最优，最终得出中国为全世界最优。理由是中国是“人主为上”，“天时之适中”，“生齿之繁，无国可比”。

论证的强辞附会是显而易见的，也恰恰反证了魏源对“世界形势”的认识水平。他是从固有的“天朝上国”的观念出发，用对“海国”的认知来论证“天朝上国”的合理性，显然不是旧观念的突破。

“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、雍正之两朝，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。夷烟流毒，罪万准夷……何患攘剔之无期，何患奋武之无会？”<sup>[1]</sup>从这则史料来看，魏源以边疆少数民族的叛乱类比英国的侵略，把英国人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等量齐观，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得英国人代表着什么，也再次说明他对“世界形势”其实没有什么概念，自然也不可能意识到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。

2. 魏源的思想足以引导人们关注“世界形势”吗？

上述史料实证表明，魏源对当时“世界形势”的认识是很欠缺的。一个自身对外部世界认识还处于懵懂状态的人，怎么可能引导别人去认识“世界形势”呢？

《海国图志》开篇即说此书目的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但我们在魏源亲撰的论述中发现了许许多多其实不用“师夷”也能“制夷”的所谓“筹略”。如“乘风潮，选水勇，或驾火舟，首尾而攻之。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，黑夜泅送船底，出其不意，一举而轰裂之”；“佯退镇海招宝山，以诱入之，而后于甬江下游狭港塞其去路，乘风火攻者，上策”。<sup>[4]</sup>

这样的“筹略”还有很多，感觉就像是一个对近代战争方式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在纸上谈兵。从逻辑上讲，既然已经有办法战胜“夷人”了，那还有必要“师夷”吗？既然“中国为全世界最优”，那还有必要关注“夷人”吗？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就是这样充斥着互为矛盾的观念。

或许，我们还会说，《海国图志》不是在日本反响甚大吗？这又作何解呢？其实，早在1641—1853年的幕府锁国时代，日本即已对西方世界产生兴趣。1774—1852年间，日本的外文译著就多达500多种，关注西方的风气已成。《海国图志》是在1854年后才在日本广为传播的，且多为选本的形式。

很显然，是因为日本人先关注西方，才关注《海国图志》，而不是因为《海国图志》才开始关注西方。而且，日本人并不是只通过《海国图志》去了解西方。我们可以说《海国图志》有助于日本了解西方世界，

但绝对不能说《海国图志》导致了日本对西方世界的兴趣，因为这是完全有悖于事实的。

综上史料实证和分析，旧人教版教材所述《海国图志》“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”一语，实在让人难表同意。我们甚至还可发一问：《海国图志》如果真的起到了“引导”的作用，又会把人们的思想“引导”到哪里去呢？

## 二、有关“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”一句的史料实证及思考

1. 什么叫“思想解放”？魏源本人是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？

何为“思想解放”？《辞海》解释是“打破教条主义、旧的主观偏见的束缚，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，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”。魏源时代对外部世界的“教条主义”、“旧的主观偏见”，主要就是陈腐冥顽的“华夷之辨”、“夷夏之防”、“天朝上国”等观念。

当时的“客观实际”是：工业革命推动欧美工业国家全球扩张，机器、资本、商品、利炮使世界混为一体，并化为残酷竞争。中华文明正面临着西方工业文明不可抗拒的威胁，唯一出路在于学习先进的工业文明，以改易求生存。

但魏源却未能认识到这样的“客观实际”。从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这个命题来看，魏源提出要“师”，但又不能以平等相对待，蔑称其学习对象为“夷”，所依恃的就是“华夷之辨”与“天朝上国”的观念。《海国图志》通篇充斥的“夷”字，正说明这是魏源坚定不摇的观念。

过去，我们一直盛赞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思想的光辉，但其实在逻辑上是经不住推敲的。“师夷长技”，更应该说是一种理智、一种务实、一种开明。军事技术不如人，学习一点敌人的军事技术，这是完全正常的心态，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，恐怕还达不到“思想解放”的程度。否则明朝曾经向西洋的“红毛番鬼”学习大炮技术，岂不也成了“思想解放”？其实，学习先进军事技术，清王朝早有先例。清军入关之前曾受挫于明军的火炮技术，遂认真向明军学习火炮技术，可谓“师明之长技以制明”。所以，我们用“思想解放”的定义来审查魏源的思想，殊难言其为“思想解放”，言其为“思想进步”，或者“思想开明”，或许更为妥当。

反过来想，军事技术不如人，连学习一点敌人的军事技术都意识不到，这样的民族其智力水准该有多低下？再反过来想，我们是不是把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捧得太高了？

相形之下，同治年间，李鸿章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议论，倒是“对客观实际”有所认识，堪称此一时期中国人看世界眼界较为高远的认识。至于维新思想则可以说是“思想解放”，因为它确实突破了传统观念，是一种质的变化。

让我们进一步地问，“师夷”的目的是“制夷”，那么“制夷”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魏源在另一部著作《圣武记》中表达了这样的理想，即“一喜四海春，一怒四海秋，五官强，五兵昌，禁止令行，四夷来王”<sup>[5]</sup>。在我们今天看来，这是一种近乎迷狂的观念。也许，走向新社会，正是魏源本人所不希望的。

我们丝毫不怀疑魏源对国家民族真挚的情感。爱国主义是高尚的，但更应该是理性的。近代中国需要怎样的爱国主义？是能够把捍卫国家和学习先进文明统一起来的爱国主义，这才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爱国主义。

2.“当时”的中国存在群体意义上的“思想解放”吗？

历史表明，鸦片战争后，绝大多数国人仍不关心外界，二十年间依旧是昏鸦乱飞，很难说存在群体意义上的“思想解放”。从逻辑上说，魏源这样的人都很说“思想解放”，而“当时”的社会反倒出现了“思想解放”，这是荒谬的。

旧人教教材在这里的确滥用了“思想解放”这个概念。我们认为，把“思想解放”改为“一部分人的思想进步”更为准确。

### 三、对魏源时代的认识

史料实证是为了求真求实，而不是菲薄前贤。阿拉伯有句谚语：“与其说人如其父，不如说人如其时代。”时代的局限是真正的局限，它把人们的观念和认识限定在某一高度或者引导向某一方向，是很不容易超越的。

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，我们不能把今天和过去混为一谈，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，否则就是一种“超历史”甚至是“反历史”的态度。但是，反过来，如果我们把古人实际没有做到的事情强加给他，没有根据地说他做到了他实际上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恐怕要比那种“超历史”

的态度还要糟糕。

对于魏源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，真正地走出中世纪，还需要时间。魏源没能突破旧时代的陈腐观念，他还没有真正的世界眼光，这是历史和时代的限制。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怎样的外部危机，该往何处去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魏源和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，都没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。对此我们也只能是徒叹奈何！

### 四、结语

以上的史料实证和分析，似足以实证：旧人教教材关于《海国图志》及其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思想起到“引导着人们关注世界形势，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启迪作用”的表述是失当的，这同时说明，新版教材略去这样的表述是得宜的。

历史是一门建立在史料上的学科，史料实证对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相信茅海建先生的一段论述能够增进我们的认识，兹摘录如下，并做本文的结束。

“就我从事的专业——中国近现代史——来说，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，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。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在匆忙中搭建，根基并不是很深。今天，年轻学生经常告诉我，他遇到的已有定评的‘史实’经不起查证，往往是一考即错。对此我也有同感。在不可靠的‘史实’之上，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、演绎、归纳，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。学术发展到今天，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，相反的是，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。其中一个大的原因，即为各自所据的‘史实’皆不可靠。因此，到了21世纪，我个人以为，在我们这一专业中，最重要的工作似为‘史实重建’。”<sup>[6]</sup>

### 【注释】

[1][2] 魏源：《海国图志》，长沙：长沙岳麓书社，1998年，第1802-1803、1850-1852页。

[3] 魏源：《海国图志·原叙》，第2页。

[4] 魏源：《海国图志·卷一·筹海篇一》，第2-5页。

[5] 魏源：《圣武记叙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2页。

[6] 茅海建：《戊戌变法史事考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5年，第1页。